

司馬遷



K825.8/2

司 马 迁

季 镇 淮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40531



上海人民出版社

740531

封面装帧 甘晓培
封面题字 朱展程

司 马 远

季 镇 淮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日历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625 插页 2 字数 89,000

1955年3月第1版 1979年11月第2版

1979年11月第13次印刷 印数 95,001—145,000

书号 11074·30 定价 0.41 元

再 版 前 言

去年冬天，我在广州，又去海南，遇见一些年轻朋友，有把《司马迁》这本小书拿来要我签名留念的，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我当然感谢年轻同志的这种好意，但总是觉得过意不去。这本小书初版于一九五五年，到现在已二十几年了。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对于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我自己没有什么大的进展，同时在学术界也没有出现一本新的专门研究著作。原因可能很多。这里只指出一点，即研究司马迁和《史记》——主要是《史记》的难处，在于它所包含的我国古代文化历史知识的广泛性，需要研究者具有较广泛的现代科学知识，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我提出这一点来，仅供有志于研究《史记》的年轻同志参考。

现在根据一般青年读者阅读的需要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计划的要求，我重印《司马迁》这本小书。在不改变本来面目基础上，作一些必要的修改和增补。考虑到文章的重要性和读者参考上的方便，我把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和司马迁《报任安书》全篇抄录在书中。限于本书体例，对它们没加以文字上的注释，但看了上下文的叙述，一般读者大致还是可以明白其内容意义的。在本书出版后不久，我

写过《司马迁是怎样写历史人物传记的》一文，对本书内容有所补充，兹附录于书后。

因为我对于《史记》并没有真正深入的研究，青年读者不能希望从这本小书中得到解决难题的锁钥。如果说，这里还有我多年来读《史记》的一些心得，值得提一提的话，那就是司马迁对战国、秦、汉史即他那个时候的近代和当代历史的“实录”精神，他重视实践和坚持著述理想的精神，以及他把历史学和文学巧妙地结合起来从而开创纪传体史学和传记文学的创新精神，这三点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只欣赏司马迁的文章，而忘记他写文章的基本精神，是不可能真正懂得司马迁的文章的价值的。当然我的看法不一定对，希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著者 一九七九年二月五日。



司 马 迁 像

——采自明王圻辑《三才图会》

五帝本紀第一

史記一凡者未是
徐氏義解徐姓名以別之

史記集解序

裴

因

曉

書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採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疎略或有抵牾其涉獵者廣博首穿經傳驛馳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

书影二

——裴骃《史记集解序》

茫茫禹迹溯龙户耕牧
山汉史村百世奇文是日河
月千秋孤憤訴晨昏給心血
历历英雄譜奮筆諍諍是
泪魂豈道名山事業重是
非終峙后賢論

題司馬遷

著者

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

目 录

再版前言

家世	1—12
遥远的世代(1) 司马谈(4)	
童年.....	13—21
龙门诞生(13) 十岁诵古文(15) 家徙茂陵(18)	
漫游、侍从和奉使.....	22—34
二十漫游(22) 入仕(28) 奉使西征(31)	
为太史令——从内廷到外廷.....	35—47
扈从封禅(35) 负薪塞河(39) 为太史令(41)	
著述理想的开始、挫折和坚持.....	48—70
开始了著述工作(48) “遭李陵之祸”(52)	
“就极刑而无愠色”(59) 一个坚持理想的老人(62)	
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历史家和文学家	71—117
伟大的著作(71) 基本方法和基本态度(73)	
人物中心(81) 褒贬尺度的人民性(85)	
人民性的来源及其局限(98) 写作方法(106)	
语言的运用(112) 历史和文学统一的范例(116)	
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118—127

附录 司马迁是怎样写历史人物的传记的 ——从“实录”到典型化	128—139
后记	140—141

家世

遥远的世代

据说历史上有一个时期，人和神住在一起，无法分别谁是人谁是神，人人都在祭祀，家家都为“巫史”，好象个个都能通神似的。大家被祭祀弄得穷困了，结果也不见有什么福气。到了颛顼的时候，他看见这种情形很不对头，就命南正（官名）重专门掌管天上的事情，大会群神，使各就各位，分出一个次序来；又命火正（官名）黎专门掌管地上的事情，大会人民，使各安旧业，不得互相侵犯。这样人和神就分开了，天上的神事和地上的人事就各管各了，这就是所谓“绝地天通”。后来，从唐、虞到夏、商，重黎的后人世世代代掌管天地的事情，使人神各有所主。在周宣王时代，重黎的后人叫程伯休父的，失去重黎氏世代相传的职守，作了司马这个官，从此就成了司马氏。

这是公元前五世纪左右，楚国的大夫观射父对楚昭王讲的故事^①，司马迁认为他的家世就是从重黎氏这样渺茫

^① 见《国语》卷十八《楚语》下。“火正”，《史记·太史公自序》作“北正”；“南正”，《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作“木正”。

的远祖传下来的^①。当公元前十世纪周穆王的时候，重黎在传说中还是上帝之下的两个主管天地的神^②，到了观射父的故事中，他们就都成为人。他们结束了“夫人作享，家为巫史”^③的局面，分司天地，作了职业的巫史，一个是巫，一个是史。观射父讲的这个故事，反映了先后不同的社会情况。但“家为巫史”即人人都是巫史的局面，其实是没有的，因为巫史并不是同时出现，而是先有巫，后有史的。鲁迅先生说：“原始社会里，大约先前只有巫，待到渐次进化，事情繁复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猎，战争……之类，渐有记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职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来记事，这就是‘史’的开头。况且‘升中于天’，他在本职上，也得将记载酋长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册子，烧给上帝看，因此一样的要做文章——虽然这大约是后起的事。再后来，职掌分得更清楚了，于是就有专门记事的史官。”^④根据观射父讲的故事，并结合鲁迅先生对史官起源的解释，似乎可以这样设想：在原始社会里，大概最初人人都祭神，人人自以为能通神；后来才有了专职的通神的巫；再后来巫兼史，巫史还是一人；又后来巫史分了家，巫主神事，而史主人事。观射父讲的重黎分司天地的故事是这最后的巫史分家的社会情况的反映。不过作为司马迁的祖先来说，重黎即使是历史人物，也是很渺茫的。司马迁所以称引这样渺茫

① 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② 见《尚书·周书·吕刑》。

③ 《国语》卷十八《楚语》下。

④ 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的远祖，不过要表明他的家世是一个悠久的史官家世罢了。并且司马谈只说他的祖先是“周室之太史”，司马迁也只说“司马氏世典周史”^①，他们都撇开了巫，而只强调史官的家世。

春秋战国以来，司马氏一族作史官的系统中绝，分散在各个地方，作着其他的官职，也有很著名的。这些，我们都不必去说它了。

这里单说司马迁出身的这一支。公元前六二〇年他们由晋迁到少梁^②——秦惠文王十一年（公前三二七年）改名夏阳^③，汉代也叫夏阳，属左冯翊，即今陕西省韩城县。战国时代，少梁一支的司马氏，在秦惠文王时，出了一个叫司马错的，与张仪同僚而意见不同，主张伐蜀，有功，因而留守于蜀。司马错的孙子叫司马靳，当秦昭襄王时（公前三〇六—前二五一年），为武安君白起部将，昭襄王四十七年（公前二六〇年），与白起大破赵军四十余万于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尽坑杀之。后三年（公前二五七年），司马靳跟白起一起在咸阳西门外的杜邮（今陕西咸阳市东）被逼自杀。司马靳的孙子叫司马昌，当秦始皇时，为秦主铁官。司马昌的儿子叫司马无泽，在汉初为长安四市的一个市长。司马无泽的儿子叫司马喜，为五大夫。司马喜的儿子就是司马谈，为太史令，就是司马迁的父亲。

司马迁的家世，即使从春秋时代算起，也够得上说是

①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② 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③ 见《史记》卷五《秦本纪》。

“源远流长”的了。但直接给司马迁以深刻影响的，只是他的父亲太史令司马谈。因此，关于司马谈，我们还应比较详细地介绍一下。

司 马 谈

司马谈死于公元前一一〇年(武帝元封元年)，生年不清楚。假定他比司马迁约大三十岁^①，那就是生于公元前一七五年(文帝前元五年)左右。司马谈生长、受教育于汉王朝的文、景时代，主要接受了文、景时代的影响。

据司马迁说，司马谈的学问有三方面。其一，“学天官于唐都”。所谓学天官就是学天文，观测日月星辰。汉代学者以为天上的日月星辰，和地上的封建王朝一样，也有君臣尊卑、大小官职之分，所以称天文星象为天官。唐都是汉代有名的观测星象的专家，晚年还和司马迁一道参加改历工作。其二，“受《易》于杨何”。杨何，字叔元，菑川(今山东寿光县)人，汉初有名的传《易》者之一。公元前一三四年(元光元年)，杨何以《易经》专家的地位为中大夫^②。《易》讲阴阳吉凶，和天文星象是有关系的。司马谈学习这些，好象是有目的地准备作一个史官的。也许他作了史官之后，才有机会也必须学习这些。因为天文星象和阴阳吉凶等等是史官的主要职掌。其三，“习道论于黄子”。所谓习道论大概就是学习汉初黄老一派的思想理论，不必专指某一书。黄子

① 司马迁生年见下章。

② 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

就是黄生，他好黄老之术，曾在汉景帝刘启面前和《诗经》专家辕固生辩论历史上汤伐桀、武王伐纣这两件事情的性质。黄生以为“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而辕固生则以为“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两人各持己见，辩论不决。最后辕固生说：“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汉景帝就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这样，两人的辩论就结束了^①。黄生和辕固生的辩论，好象针锋相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其实都是为新建的封建王朝服务的。秦末农民起义的结果，消灭了一个旧的和建立了一个新的地主阶级的封建政权。辕固生所以强调汤武“受命”，目的在于说明汉高帝刘邦代秦即天子之位的根据。相反，黄生以为汤武不是什么“受命”，而是“弑君”，目的也不难看出，在于防止臣民的“乱动”，以巩固新建的封建政权。所以在汉景帝即当时最高的封建统治者看来，黄生和辕固生的议论都很对，没有争执的必要，“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但从封建统治者看来，更切实际的还是黄生的议论。因为在汉景帝时代，汉之代秦，早成历史事实，“受命”也罢，不“受命”也罢，刘家总归已经坐了天下。现实的问题，不是“受命”不“受命”，而是天下坐得安稳坐不安稳。汉初的封建统治阶级即地主阶级，从最高的当权派汉文帝、汉景帝、窦太后、曹参等等以及一般地主阶级分子，所以提倡黄老思想，主张“清净无为”——即对人民缓和压迫、减轻剥削，根

① 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

本的原因，在于消除人民的“乱动”思想，以坐稳天下，巩固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黄生的思想是文、景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即统治的思想。司马谈“习道论于黄子”，正是受这种统治思想的影响。

公元前一四一年（景帝后元三年），汉景帝卒，皇太子刘彻继位，他就是汉武帝，从此汉王朝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时经过六、七十年的相对安定的局面，汉初以来王国割据势力已经逐步消除，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已经相当巩固，随着生产事业的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它必然结束“无为”政治，改变为以“仁义”为缘饰的“多欲”政治。在思想方面从窦太后死后（公元前一三五年，建元六年），儒家思想代替了黄老思想，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即统治的思想。司马谈在汉武帝建元年间（公元前一四〇——前一三五年），果然学有所用，开始作了史官，即太史令，通称太史公。“公”是当时习用的称呼，不一定是尊称。史官是汉武帝新设的一个官，职掌天时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在汉武帝看起来，不过是倡优一流，世俗也很轻视。史官从来还职掌记录，搜罗并保存典籍文献，这是史官的传统。司马谈自觉地继承了这一传统。

司马谈作太史令后，精神上感受到压抑和苦闷，这恐怕不仅由于他的职位的卑微，更重要的还由于他的政治思想和当时的统治思想存在着分歧。他深受影响的是黄老一派的“道论”，而当前走运的却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汉武帝大力提倡并实践之下，司马谈公然反对了没有，我们无法知道。可是从现存唯一的题为《论六家要旨》的司马谈的那